

SUMMARY 論文提要

《抱朴子·外篇》中的「行」——以《外篇·行品》為線索

ZANG Luning 臧 魯寧

在《抱朴子》外篇行品篇中，葛洪將人分為善惡兩類，每類又細分數十類型。本文以此分類為線索，釐清其本質結構，結合內外篇探究葛洪善惡觀的特點。管見所及，既往研究尚未對此分類進行充分分析，為數不多的研究對此分類的解讀也有待商榷。雖然性說是儒家重要命題之一，王充、王符等亦曾圍繞性三品說展開討論。不過，頗受漢儒影響的葛洪在《抱朴子》內外篇中不僅沒有圍繞性說展開討論，僅以行為——「行」作為區分善惡的依據，甚至全然不提善惡與「性」的關係。另外，從行品篇關於「聖人」「賢人」「愚人」的描述可以看出，葛洪判斷人物賢愚的標準有別於儒家傳統思想。加之，在行品篇分類中，並非善惡之外又有「下人」，「下人」實際與「惡者」同義。因此，葛洪的善惡分類不僅在內容上與性說無關，結構上亦與之無涉。此種善惡觀與葛洪重「行」的思想和唯才是舉的觀念密切相關，同時也在其仙道理論中有所體現。

北宋繪畫論中的「幻」——「幻」之概念的由來及其含義

WANG Huan 王 歡

中國早期的畫論文獻中並沒有以「幻」評價繪畫的言論，宋代之後，評價繪畫的詩文中則常見「幻」這一用語，特別是在僧侶與參禪文人之作中較為普遍。本文以為，北宋繪畫評論中「幻」這一概念來自於佛教的般若空觀思想，「幻」為解釋「空」之十喻之一。在空白的畫面上創作形象的過程，與佛教思想中世間萬物生於虛空這一理念相近，故而繪畫也常作為解釋「空」、「幻」之譬喻而被提及。另一方面，「幻」這一概念也吸收了北宋時期文人獨特的審美趣味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。本文在考察「幻」之思想由來的基礎之上，圍繞北宋時期繪畫論中「幻」的使用與含義，以及被評價為「幻」之繪畫的創作方式與畫面形式等問題進行考察，明確了北宋時期繪畫評論中「幻」這一概念的思想內涵及其特徵。

朱熹的自欺說——最晚年的《大學章句》《大學或問》改訂

NAKA Sumio 中 純夫

關於自欺（《大學章句》傳 6 章）的定義，朱熹最晚年的見解可分為以下三類：A 類，認為兩箇心和小人閑居為不善均是自欺；B 類，以小人閑居為不善為自欺；C 類，以兩箇心為自欺。現行本《大學章句》《大學或問》乃朱熹晚年絕筆或是近於絕筆的著作，故其自欺說可視為朱熹的定論。經本文分析，《文集》卷 15〈經筵講義〉（65 歲）屬於 B 類，《章句》《或問》屬於 C 類，故 C 類應為朱熹自欺說的定論。而《文集》卷 63〈答孫敬甫〉第 6 書（69 歲）屬於 C 類，且內容與《章句》《或問》極其相近，並且朱熹提到了自己最近對《章句》《或問》自欺說的改訂。可以推測，此次改訂應與〈答孫敬甫〉書的立場相同，而經過改訂的《章句》《或問》亦當更接近於定稿（定論）。因此，關於《章句》《或問》定稿的成立過程，可作如下推定：①〈經筵講義〉（65 歲）→②〈答孫敬甫〉第 6 書（69 歲）→③現行本《章句》《或問》（晚年絕筆）。

「禮教」的滲透、汎化及其展開——從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之事例出發

ITO Takayuki 伊東 貴之

前近代中國，在儒教的理念中，「禮」與古聖人的制作有關。如對朱熹而言，作為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則」的「禮」，正是自然界美好的道德秩序——「天理」，在人世間具體、客觀的體現，是規範政治社會「秩序」的核心，亦是「中華」文明的標志。近年的研究也出現了同樣的觀點，即認為近世中國，尤其是明清，其以儒教為基軸的基層社會是「禮教社會」「禮治體系」。從當時的儒教教說的層面來看，有朱子學、陽明學、考證學等諸多發展，而在實踐及社會性的層面，也能看到「禮教」在向更廣泛的人群滲透，可以說是某種「文明化」。為了與西歐、日本、韓國（朝鮮）相對照，小論首先梳理了作為儒教的、中華的「禮」及「禮教」的解釋。在此之上，將之與近世朝鮮王朝和日本的事例進行了比較。除各自不同的政治社會與習俗外，小論特別關注了明清交替（所謂「華夷變態」）時，東亞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，是如何影響到朝鮮、日本對於「禮」及「禮教」的認識。